

# 鄭州會議與徐州會議

王禹廷

## 馮玉祥與西北軍之一一十六

民國十六年六月，接連舉行的鄭州會議和徐州會議，對於清黨反共，繼續北伐的革命大業，作出了明確的決定，其意義是重大的，其影響也是深遠的。對於馮玉祥來說，也奠定了他稱重一時的顯赫地位和權力。

### 鄭州之會重大協議

當馮玉祥、唐生智的兩部大軍，正以鉗形攻勢分途合擊，鄭州將下未下時，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（鄧氏於十六年春間，寧漢分裂肇端之後即脫離蔣公左右，而與武漢方面沆瀣一氣）由豫南繞道至陝州，晉見馮玉祥，代表武漢方面，歡迎馮氏東來，共商今後革命進行計劃。迨鄭州既克，武漢方面的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團汪精衛、譚延闓、徐謙、孫科、顧孟餘等，由漢口專程北上，六月六日到鄭州，會晤唐生智，并即電邀馮玉祥迅即東來，面商大計。馮氏即偕鄧演達兼程東行，於十日到鄭州，汪精衛等黨、政、軍要員，齊集車站歡迎。馮氏身穿灰色土

布軍服，背負土製雨傘及乾糧袋，與一般官兵同樣的裝束，從一輛蓬車上下來，走到歡迎者的面前，各人相視錯愕，拱手為禮。次日（十一）起連續舉行了兩天會議，商定黨、政、軍要案多件：

#### 一、黨務方面：

組織開封政治分會，為豫（河南）、陝（西）、甘（肅）三省的黨政最高指導機構。以馮玉祥、于右任、徐謙、顧孟餘、王法勤、于樹德、鹿鍾麟、劉伯堅、薛篤弼、郭春濤、楊明軒等十一人為委員。馮玉祥為主席。指導河南、陝西、甘肅（那時青海和寧夏尚未分省設治，甘肅事實上包括甘、青、寧三省。）三省的黨務、政治。

#### 二、政治方面：

成立河南、陝西、甘肅各省政府，人事安排如下：

1. 河南省政府主席馮玉祥，委員孫岳、鹿鍾麟、薛篤弼、劉治洲、張鴻烈、鄧哲熙、戴修瓚、靳雲鶚、方振武、梁壽愷、劉鎮華等。靳雲鶚

兼民政廳長，薛篤弼兼財政廳長，張鴻烈兼教育廳長，劉鎮華兼建設廳長，鄧哲熙兼司法廳長。

2. 陝西省政府主席于右任，委員鄧長耀、嚴莊、過之翰、楊基奎、段韶九、鄧寶珊、茹欲立、李元鼎、石敬亭、井岳秀、思有光、王授奎等。鄧長耀兼民政廳長，嚴莊兼建設廳長，過之翰兼財政廳長，楊基奎兼教育廳長，段韶九兼司法廳長。

3. 甘肅省政府主席劉郁芬，委員李明傑、楊慕時、趙元貞、韓駿傑、馬鶴天、宋哲元、鄒道儒、馬麟、馬鴻賓等。李明傑兼民政廳長，楊慕時兼財政廳長，趙元貞兼建設廳長，馬鶴天兼教育廳長，韓駿傑兼司法廳長。

#### 三、軍事方面：

1. 河南、陝西、甘肅三省，一律劃為第二集團軍的防地，豫南、豫東、豫北之殘敵，一律由馮軍負責肅清。

2. 駐在河南境內歸附革命的雜軍，均由馮軍收編，賦予第二集團軍的統一番號。（初期編為

八個方面軍，以後增為九個方面軍。」

3. 唐生智、張發奎等部，回師武漢，安定湘（湖南）、鄂（湖北），鞏固後方。

由以上各項決定看來，包括河南、陝西、甘肅（青海及寧夏在內）各省的廣大的中原和西北地區，所有黨、政、軍全部重責大任，完全擺在馮玉祥的肩上，是乃馮氏一生最煥赫的時期，也是他負擔最沉重的時期。

馮玉祥此時所統率的軍隊，連同嫡系及新附的雜軍在內。共達四、五十萬人之多，算是他一生擁兵最多的時期。

### 馮與武漢政權清共

馮玉祥擁兵最多，事實上固然是馮軍連年力戰經營的結果，但就法理而言，則是武漢的「國民政府」所給予的。武漢政權為什麼對馮玉祥如此慷慨？作如此大幅度的讓步？蓋因湘（湖南）、鄂（湖北）、贛（江西）、粵（廣東）等省發生了反共風潮，武漢政權的基礎動搖。馮玉祥雄據中原，介於寧（南京）、漢（武漢）之間，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。而寧、漢正鬧分裂，「東征」「西征」之說，甚囂塵上，他們為了換取馮玉祥的合作支持，不得不忍痛犧牲，以便唐生智班師南歸，安定後方，策劃「東征」。同時也因馮玉祥堅決提出南京、武漢和他本人三方面共同北伐的要求，與武漢方面發生了歧見。武漢諸人便不能不遷就他，所以才把已經到手的中原大地，交給馮玉祥。形勢比人強，主客觀環境的交互影響，乃產生了此一結果。

鄭州之會，除了上述的重要決定以外，還有對馮氏影響最大的，就是武漢北來的諸人，紛紛將俄共黨徒在兩湖（湖南、湖北）及粵（廣東）、贛（江西）各省跋扈兇暴，及蘇俄顧問鮑羅廷等人的專橫陰鷲種種實情，向馮詳述，且皆甚表不滿。其中以徐謙、顧孟餘兩氏及唐生智部將劉興、何鍵等所言尤為痛切，他們均對共黨恨之刺骨。其時馮玉祥對於共產黨徒在陝西各地的胡鬧亂搞，尤其是它們採取直接行動，隨意殺人，擾亂秩序等，不法行為，本已極度不滿。惟以格於國民黨正在採取聯俄容共的政策，他只好隱忍不言，以免搗上「反革命」或「違黨紀」的罪責。現在得知黨中要員及軍中將領，對於俄共黨徒及左傾份子的罪行，同感憤惡。而南方各省與陝西同胞所受的痛苦，也如出一轍。乃加強了他擁護蔣公中正澈底清共的決心。他當時對武漢方面，還要了一套兩面手法，他對汪精衛說：「有許多人勸他與蔣總司令合作，他都「一笑置之」。其實他已經偏重在蔣公的一邊，他曾對馬伯援（馮的朋友，也是他有時對外接洽的代表之一，常奔走於各方。）說：「共產黨的辦法萬行不通。」「共產黨的陰謀，吾早知之，即將赴徐州與蔣總司令晤商辦法。」

鄭州會議舉行期間，南來諸人獲接共黨首領陳獨秀拍來密電，謂馮玉祥業已歸順南京，促他們迅即南旋，免生意外。汪精衛等乃於會議甫畢，即行匆匆返漢口，只留顧孟餘和徐謙兩人，在開封協助辦理政治分會的事。顧、徐兩人稍後也皆南歸，徐謙因與馮關係密切，仍常來往，以後馮

氏有關清黨事宜，都出於徐之策劃。又汪精衛等南旋時，譚延闓藉口遊覽嵩山，未與汪等同行。他多留了兩三天，與馮玉祥單獨長談，交換意見，他認為馮氏合作清黨，決無問題，曾電南京蔣總司令有所表達，此亦為促成蔣、馮結合的另一因素。

### 于右任送客不下車

鄭州會議還有一段插曲。當馮玉祥離開陝州，赴鄭（州）開會之時，曾電請于右任由西安趕來參加。會議開完以後，南來諸人離鄭（州）返漢（口），馮、于等人皆在車站送行，并相偕登車周旋。等到火車要開動了，馮下車揚手告別，看見于還在車上，大聲喊叫「右任、右任、右任、車要開了，快請下來。」于却高聲答說：「我要同他們去武漢了，再見，再見。」馮聽了驚詫不已，但汽笛一鳴，車已開出，這兩位在北方共圖革命大業的伙伴，便告暫時分手。蓋于氏以革命元勳，已達成其引導馮軍加入革命行列、解救西北鄉邦的任務，自不願留在西北，屈居馮氏之下，聽其任使。同時以當時主客觀的環境因素，于氏留陝，亦難發揮其長才與作用，故不如離去為佳。但如事先提出，必難獲馮氏的同意，所以才出之以突然的行動，使馮氏猝不及防，無從挽留。于氏的思慮周密與行動機警，即此一端已可概見了。于氏走後，原定由他出任的第二集團軍第六方面軍總指揮及陝西省主席兩職，均由石敬亭接替代理。

### 蔣公卓見南北協力

緊接着鄭州會議之後舉行的蔣、馮徐州之會，是北伐過程中另一高潮。也對此後國家大局的發展，產生了不可磨滅的良好作用。

蔣公爲了團結各方實力，完成國民革命，高瞻遠矚，無所不照。十五年北伐前夕，廣州的國民政府，完成了兩廣的統一，革命的根據地業已鞏固。遠在北方由馮玉祥領導的國民軍，則正在與奉（張作霖），直（吳佩孚）大軍激烈拼鬥，處境日漸不利。蔣公盱衡大勢，就提出即行北伐的主張。他於十五年元月四日，在國民政府公宴席上的演說，元月六日在國民黨二全大會所作的軍事報告，都根據敵我雙方的狀況分析，強調此一主張，惜未爲黨政當局所接受。是年春夏間，吳（佩孚）、張（作霖）聯軍，以雷霆萬鈞之勢，對冀（河北）、察（哈爾）地區的國民軍，大舉圍攻，蔣公對之寄予很大的注意與關切。他於四月三日，正式向中央提出出師北伐的建議：

「北方國民軍退出（北）京、（天）津以後，中國形勢會有迅速而重大之變化。如奉軍佔領（北）京、（天）津，則日本在華之勢力，愈加穩固；吳佩孚在鄂（湖北）、豫（河南）之勢力，英必竭力助長之；孫傳芳盤踞（江）蘇、浙（江），英必逼孫（傳芳）與吳（佩孚）聯；美國近且有聯孫（傳芳）以牽制日本之傾向；法國恐蘇俄在華勢力之復張。故意欲與英、日聯合戰線，在滇（雲南）助唐（繼堯），以牽制廣東之北伐。」

「總之，列強在華，對於北方國民軍處置既畢之後，其必轉移視線，注全力於兩廣（廣東、

廣西）革命根據地無疑；且其期限，不出於三月至半年之內也。」

根據上述，蔣公對於國民軍的成敗及其影響之重大，剖析極爲透澈。而其提前北伐的主張，更是秉其大智的考慮，大仁的襟懷，和大勇的決斷。這一建議乃爲中央所採納。四月十六日，蔣公被推舉爲軍事委員會主席。六月五日，奉國民政府之命，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。七月九日，在廣州誓師北伐。以後軍次長沙，聞馮玉祥由俄國派來的代表徐謙、李鳴鐘、劉驥等到達廣州，立即電請在廣州的鈕永建等有關人士，速與洽商南北兩軍密切聯繫的辦法。後來徐謙出任國民政府司法部長，劉驥一直跟着由粵北行的中央，到達武漢，代表馮氏接洽一切。迨江西克復，蔣公駐節南昌，李鳴鐘即由上海到漢口，再轉南昌，作爲馮玉祥在蔣公總司令部之代表。十六年春，馮玉祥到西安，蔣公即派彭程萬（辛亥革命時曾任江西都督）繞道赴陝，作爲蔣公在馮處的代表。這樣一來，蔣公與馮玉祥，不但函電互通，而且均有高級代表，居中聯繫，所以雙方的關係，至爲融洽密切。

### 黃郛與李烈鈞奔走

此外還有蔣公和馮玉祥共同所重的兩個人——黃郛和李烈鈞，在中間極力溝通聯繫，發生的效果很大，黃對此致力尤深。黃郛一向反對內戰，能縮短戰爭最所希望。他認爲北洋軍閥雖成尾聲，然直、奉合作，則北軍勢力尚在國民革命軍之上。長江流域及近海一帶人民，鄉土觀念較輕，

且受北軍駐防侵凌有年，厭惡北軍之心理，有助於國民革命者甚大。若非恐懼共產，真可單食壺漿以迎王師。

國民革命軍出長江以後，北上至黃河流域，這些有利條件逐漸沖淡，反之，加強了北軍的鄉土觀念，故用兵亦漸困難。在北方之馮玉祥、閻錫山兩個力量，或思想、或歷史、或友誼，均可與國民革命軍合作。若蔣公能引閻、馮爲助力，這個中心力量可以減少內爭而獲致統一。黃更認爲此時的國民革命軍，已不惜與北方各方面謀協調，其目的爲早致全國統一，其理由在於革命軍內部已在分裂。那時武漢方面亦在與各方拉攏，蔣公能用之兵亦不一致，政府更少人負責，一切責任在蔣公身上。

這時舉足輕重其間的一個人是馮玉祥，南京、武漢兩方都在爭取他，漢方更有人包圍他。馮軍駐區在扼京（平）漢、隴海兩大幹線的河南，進可以控制津浦線。馮的個性很可能與武漢接近，馮若偏向武漢，則南京增加困擾。馮向南京，則武漢就立腳不住。此情形南京知之，武漢知之，故均盡其全力，爭取馮玉祥的合作。黃郛與蔣總司令公私交至篤。黃與馮在北方有長時期的深交，又有十三年首都革命的患難歷史。許多人批評馮很「偽」「易變」，黃則認爲馮對國家的觀念不薄，移風易俗之志甚切，做得過火。然艱苦從行伍出身，知他者不多，蔣公和南京的黨政要人，與馮關係都不深。此時，爲了促成蔣、馮的眞誠合作，黃郛用的心思最多，下的工夫最大。如果由黃氏親自出面奔走，則收效比較容易。可是蔣

公對黃另有借重，不能放其遠離，乃接受黃氏介紹，以王正廷代黃，往駐馮處為代表。

馮玉祥與王正廷有舊，即以王為隴海鐵路局督辦兼鄭州市長，以資借重，并表示對蔣公及黃郭的尊重。民國十七年五、三濟南慘案發生，黃郭適任外交部長，引咎去職，以王正廷繼其任，即出於蔣、馮在黨家莊（濟南以南津浦鐵路的一個站）會商決定。時在鄭（州）、徐（州）兩地會師之後。

### 蔣公與馮初次見面

先是，當國民政府遷都武漢之際，李鳴鐘滯留上海，未與徐謙、劉驥同行。嗣隨馮訪俄之毛以亨由俄回國至滬（上海），即與李鳴鐘同行到漢口，接洽馮軍經費問題。此事本由劉驥駐漢口交涉，武漢政權答應每月撥付二百萬元，其實是口惠而實不至。李鳴鐘和毛以亨繼續洽請，也未獲具體結果。他們在漢口與黃郭見面，即同赴南昌，晉見蔣公。此後李鳴鐘就常在蔣公處，追隨連絡。不久，國民政府定都南京，實施清共，蔣公令毛以亨攜其親筆信和密電本，前往西北見馮，致殷切爭取之意。蔡元培、吳稚暉、李石曾諸人，也皆有親筆信致馮，力主清黨反共，交毛帶去。毛以亨由上海繞道天津，經山西到潼關，向馮面陳蔣公及蔡、吳、李諸人的函件，并作了三個小時的詳細報告，馮氏清共之意遂決。以後鄭州及開封接連克復，隴海鐵路全線打通，鄭州會議甫行開罷，馮玉祥即派毛以亨赴徐州，晤見李宗仁、白崇禧，經過一番長談，李、白向蔣公報

告，蔣公決定與馮玉祥在徐州會晤。於是決定中國政局發展的徐州會議，乃告揭幕。

蔣公於六月十六日乘晚車離開南京，馮的代表李鳴鐘隨行，十七日到徐州，立即電邀馮玉祥來徐，共商黨、政、軍大計。馮氏即由鄭州東行，他起程之時，極端保密，先令鐵路局備車，準備西去。待他及隨行員兵上車，機車發動後，臨時突令改向東開，他照例乘坐蓬車，隨員何其鞏、熊斌等則坐頭等花車。專車開動不久，即有炸彈爆發，馮等得免於難，亦云幸矣。蔣公對於馮氏此來，待以最大的殊禮和誠意。他於馮玉祥離鄭（州）東行之際，派遣代表何成濬、方本仁，偕同李鳴鐘、毛以亨，先到鄭州、徐州之間的歸德（商邱）車站，遠道迎候。蔣公本人率同李宗仁等高級將領，親迎於徐州以西數十里之黃口車站。馮於十九日到黃口，即進入蔣公的專車，同赴徐州。這是馮氏與蔣公及南方將領第一次見面，在專車客廳內，馮向在座者一一請教姓名，因南北語言隔閡，竟把賀耀組誤聽為何應欽，賀立即遞上名片更正，亦趣聞也。南京方面趕來的黨政要人胡漢民、張人傑、吳敬恆、李石曾、蔡元培、鈕永建、黃郭、李烈鈞等，則在徐州近郊的九里山麓車站歡迎。

當晚（十九）在徐州東門大街花園飯店，舉行盛大宴會，蔣公首先致歡迎詞：「此次南北軍事領袖，把臂言歡，商洽黨國大計，意義極為重大，真是革命史上最重要的一頁。……」馮玉祥繼起發言：「直、奉的軍閥吳佩孚、張作霖，每說南北雙方的赤化頭子，是蔣介石和馮玉祥。其

實我們何嘗赤呢；我們的赤是赤心、赤胆、赤手，為着赤子們去革命。他們想殺我們，就給我們一頂赤帽子戴上。現在兩赤見面，就是為了救中國。這次第一集團軍北伐的功勞，我很欽佩。……」吳敬恆緊跟着說：「今天在這裏，可說是紫氣東來。我們的赤，是赤裸裸的三民主義，純潔無瑕，不含渣滓，以總理的三民主義救中國。……」宴會就在這樣傾心交談，輕鬆愉快的氣氛中，盡歡而散。

### 徐州會議溝通見解

席散以後，即由李烈鈞和黃郭居間，溝通蔣公和馮的意見，因黃、李兩人與馮有深交，共過患難，說話比較方便。蔣公當時認為，北伐正在順利進行的中途，俄共黨徒利用國民黨內左傾的野心政客與軍人，篡黨竊權，背叛中央，造成寧漢分裂的悲劇。唐生智竟然狂呼「東征」，準備與師東進，陰謀顛覆，這不但阻礙北伐，而且自殘同類。因此，對於武漢的反黨行動，必須早日撲滅。故擬以第一集團軍的一部兵力，扼守（江蘇、魯（山東））邊境，以固京畿。而以渡江北伐的主力，撤回南京，溯（長）江而上，直搗武漢。希望馮玉祥由豫（河南）出兵，沿京（平）漢鐵路南下，向武漢兩路夾攻，先清內部之憂，然後移師北伐。

這是國民政府，一貫採行的先安內後攘外的策略。但馮玉祥對此主張却不表示同意，為什麼呢？因為他也有他的看法和主張。

馮玉祥認為當面的奉直魯軍和孫傳芳的殘部

，才是國民革命的真正敵人，應該首先以全力將其消滅。武漢方面，是革命陣營內部的糾紛，意見縱有不同，儘可設法消除，不必以兵戎相見，給敵人造機會。如果此時對武漢用兵，則奉、直魯軍和孫傳芳的殘部，傾巢而出，我軍腹背受敵，北伐大業將有敗於垂成的危險。馮氏這一說法，就其時國民革命的全局來說，固然冠冕堂皇，相當正確。但在骨子裏他還有一點沒有滲透，一點不敢放鬆。沒有滲透的是他對於共產黨的邪惡本質，認識不清，所以才覺得寧漢之間是內部的糾紛，不主張用武力來解決。因此就對國府先安內後攘外的高明策略，不能領會，不肯接受。不敢放鬆的一點是就他的本身處境來看更為重要，他認為以他轉戰數省的飢疲之軍，處於中原四戰之地，倘若揮軍南下，奉、直魯軍從後乘之，加上內部反側勢力的牽扯，招致敗亡的顧慮實在太大了。還有一層，當時，寧（南京）奉之間，已有秘密接觸，張作霖提出來的條件，就是要奉、寧（南京）和晉（山西）閩（錫山）合作，共同解決馮玉祥而為蔣公所拒絕。（這一內幕，留待以後詳述。）馮玉祥對此不能毫無所知，他的警覺性自然也提的很高。因此，他在鄭州會議時，拒絕了武漢方面共同「倒蔣」的要求，堅持其一致北伐的主張。而且他那時所有的黨、政、軍崇隆地位，在法理上都是由鄭州會議而來，會議甫過，言猶在耳，何能背信棄義，對武漢揮戈相向？所以他對共同進兵武漢的意見，不肯接受。幕後折衝的結果如此，等到第二天（二十日）正式開會時，便未再提進攻武漢的事。

### 討論主題所獲結論

徐州會議開了兩天（六月二十一—二十一日）。據吳敬恆事後在南京中央政治會議的報告，其討論的問題雖有：

- (一) 黨的問題；(二) 目前政治建設問題；(三) 對於共產黨辦法；(四) 繼續北伐問題；(五) 武漢政治問題；(六) 政治部改良問題；(七) 國民會議籌備問題；(八) 軍事問題等八項。

但焦點則集中在如何對付武漢，而使其不受共黨操縱且能繼續北伐的一個大問題。會議的結果對於此一大問題，大體上獲致了結論，而以下列方式表達之：

#### 一、蔣、馮聯銜聲明（六月二十一日）：

「我總理致力國民革命四十年，以求中國之自由平等。當辛亥之歲，遂覆滿清，創造中華民國，實為四百兆民族解放之基本。乃滿清之遺毒未除，帝制變形之軍閥遂起。自袁（世凱）以來，外與帝國主義為緣，內則肆其荼毒，使吾民罹火熱水深。十餘年來於茲，民衆感其痛苦，亦即覺悟而奮興。我國民革命軍。爰繼續總理之遺志，應民衆之要求，誓師北伐。中正、玉祥偕吾同胞，轉戰數萬里，前此猖獗一時之軍閥，已次第崩摧。惟帝國主義之工具一日未盡除，即吾同胞同志之責任一日不能去。茲當會師魯（山東）、豫（河南），更益進行之際，謹掬誠悃，為海內外告：中正、玉祥與數十萬將士，為三民主義而奮鬥。凡百誘惑在所不顧，凡百艱險在所不避，

凡百犧牲在所不憚。必期盡掃帝國主義之工具，以完成國民革命之使命而後已。武力為民衆之武力，成功即民衆之成功。惟我同胞同志，實共鑒之。蔣中正、馮玉祥同啓。」

#### 二、馮玉祥的馬（六月二十一日）電（黃郭手稿）：

武漢汪精衛（兆銘）、譚組安（延闓）、孫哲生（科）、徐季龍（謙）、顧孟餘（兆熊）諸先生并轉諸同志勳鑒：前在鄭州諸兄所談武漢情形：店員脅迫店主，職工脅迫廠主，佃戶脅迫地主。甚至利用打倒土豪劣紳之標語，壓迫出征軍人之家庭，前方苦戰奮鬥之將士，力不足以保護其在鄉之父兄。彼等陽冒國民革命之名，陰佈全國恐怖之毒。他如別有用心之不良份子，攙入地方黨部，擅行威權，殺人越貨，中央黨部屢加制止，竟敢充耳不聞，以致社會根本動搖，四民無一安寧。為今之計，鮑（羅廷）顧問已經解職，亟宜設法使鮑歸國。在武漢之國民政府委員，除一部份可以出洋暫行休息者外，餘均可合而為一到寧（南京）供職等語。抵徐（州）後已盡情與寧（南京）來諸同志一一披陳，而寧（南京）方同志，聞之無不悲喜交集，感慨無量。現在雙方處境之苦，業已完全瞭解，值此風雨飄搖之際，千鈞一髮之秋，既異地而同心，應通力而合作。敢請諸兄速決大計，早日實行。俾國民革命於短期內得竣全功，救吾民於水深火熱之中，完吾黨三民主義之業。國家安危，在此一決。迫切陳詞，亟盼明教。弟馮玉祥叩馬（二十一日）。」

### 三、蔣總司令的談話（七月六日在上海發表）：

「此次會議結果：第一、黨必須統一，不許武漢黨部存在，武漢方面的忠實同志，希望他們速到南京來和我們合作奮鬥，不要被人利用（這是馮的意見）。第二、馮知共產黨在國民革命中只有搗亂，沒有幫助，決定要他們離開中國，這一點馮表示很為堅決。第三、武漢軍隊不得長在武漢搗亂，仍須回至河南，加入前線，共同一致完成國民革命。中央執監委員對此完全同意，認為要我黨基礎鞏固，一定要○取消武漢偽政府；○趕走共產黨；○武漢軍隊重回河南加入革命。」

### 五大效果影響深遠

由於徐州會議有了如上所述的重大決定，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出：

一、南京國民黨中央於四月十二日，國民政府於四月十八日所決定實施的清黨反共運動，已為全黨全國所一致接受。就是武漢方面，汪精衛也於七月十五日公開宣布「分共」。

二、把蘇俄派來中國的陰謀顛覆份子，全部驅逐回俄，粉碎了俄帝對中國直接操縱干預的妄想與狂圖。

三、對武漢方面，不採用武力解決的途徑，消除了革命軍內部的鬩牆之爭。（但以後因為唐生智揮軍東下，南京中央還是派兵去弭亂。）

四、馮玉祥雖然不曾全部接受蔣公的主張。但在清黨反共、合作北伐的大方針上，完全站在

蔣公的一邊，加速了武漢政權的崩潰和北伐統一的勝利成功。

五、南北各方的國民革命軍，在蔣公統一領導之下，合作北伐，完成了國民革命統一全國的

大業。

總之，在北伐革命的過程中，徐州會議確實為勝利成功提供了最佳保證，它的意義是非常重大的，影響也是非常深遠的。

# 拉丁美洲見聞

隆重出版  
歡迎購閱

劉昌博教授著

定價新台幣柒拾元

本書係名記者劉昌博教授精心傑作，記述訪問拉丁美洲各國見聞，幽默風趣，百彩紛陳，令人目不暇接。要目有：(一)江湖兒女的故事。(二)爪地馬拉「我的媽呀！」(三)關公在薩爾瓦多。(四)百萬美金的支票。(五)尼加拉瓜暴富記。(六)女兒國男人逃婚(宏都拉斯見聞)。(七)美人窩失眠記(哥斯達黎加的魔影)。(八)巴拿馬的食肉蝶。(九)波哥大歷險記。(十)玻國男女政變情變忙。(十一)一家烤肉萬家香(巴拉圭夜不閉戶)。(十二)烏拉圭美人遲暮。(十三)聖保羅的僑情。(十四)海灘、足球、森巴舞。(十五)荒原上的螞蟻雄兵。(十六)委內瑞拉富甲南美。(十七)光棍總統鐵腕治國(多明尼加風情畫)。(十八)黑人島——海地。(十九)功夫大使載譽歸國。附錄：拉丁美洲各國土地、面積、人口、幣值、物產及貿易概況，我國駐拉丁美洲各國及拉丁美洲各國駐我國使節、館址一覽，全書二十餘萬言，穿線平裝，現已出版，歡迎購閱。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。